

新诗的审美标准： 一个实践性的课题

□张立群

审美标准作为新诗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自其生成之日起,就与人们的认知、理解和诗歌之美紧密联系在一起。主体的介入和审美客体的存在,是审美标准建构的前提与依据。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文化心理和特定对象审美特质制约,任何一种审美标准的确立,既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又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新诗的审美标准可主要从“时代标准”和“普遍标准”两方面加以考察,除“时代标准”和“普遍标准”之外,新诗的审美还在具体言说时带有鲜明的“个人性”。



随着“纪念新诗诞生百年”的主题活动在各地召开,新诗的历史成就、艺术水准、现代性与合理性等问题又重回人们的视野。相比新文学运动以来其他文体形式,新诗的道路曲折、坎坷,争议最多。新诗迟迟没有建立起令人满意的文体形式,使新诗的传统、概念等问题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这自然不利于新诗创作与研究的发展。中国新诗发展至今已百年历史,一个世纪的创新实践已为其理论探索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在充分结合新诗实践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前提下,笔者认为:围绕新诗而产生的诸多有争议的话题,其实都可以通过历史的、客观的、辩证的分析加以阐释、得出适当的结论;而在此过程中,使用理性的、动态的眼光去看待新诗尤为重要。

审美标准作为新诗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自其生成之日起,就与人们的认知、理解和诗歌之美紧密联系在一起。主体的介入和审美客体的存在,是审美标准建构的前提与依据。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文化心理和特定对象审美特质制约,任何一种审美标准的确立,既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又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结合以往的一些著述可知:新诗之所以迟迟未能建立起系统、完整的审美标准,主要与具体识别过程中人为地“割裂”诗歌传统,没有采取整体的、发展的角度去看待新诗有关。毫无疑问,新诗要在诗的范畴内解读才能获得合理的认识,而“诗的范畴”的确认其实已然决定新诗应当有自己的传统和现实,有诗与非诗的分野。新诗或曰现代诗歌虽以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姿态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诞生,但从中国诗歌历史的视野来看,它仍是中国诗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时代、文化

等外力因素的影响下,新诗的崛起虽使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新的面貌,但它的出现不过是在遵循文学内在演变规律的同时深化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只要对比中国古代从汉乐府古体诗到五七言律诗、从唐诗到宋词的演变史特别是其初始阶段,所谓“反传统”自身最终成为“传统”的有效组成部分,我们便不难得出新诗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合理性。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如下一些事实:其一,胡适作为新诗“尝试”第一人,其思想、观念之新的意义远胜于其白话诗的具体实践,这一客观事实造成新诗起点不高、实践大于艺术。其二,新诗作为一个新生儿,虽貌似反叛传统,但实际上一直被笼罩于强大的中国诗歌传统之下;谈及新诗的语言、形式等问题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与古典诗歌进行对比,始终是在认知层面上困扰新诗的难题之一。其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诗歌创作受时代的影响而形成特定时代的创作主潮;然而,特定时代出现的诗歌主潮凸显的只是一种符合时代标准的审美趣味,从长远的历史来看,它不一定能够成为建构广义诗歌审美标准的依据。

新诗的“时代标准” 与“普遍标准”

鉴于新诗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新诗的审美标准可主要从“时代标准”和“普遍标准”两方面加以考察,而具体谈及新诗的审美,还需要区分美感与美学层面的辨析。以近20年新诗的发展趋势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新诗由于受到消费时代、快餐文

化和网络技术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呈现出文化的倾向。新诗从纯文学的领域向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扩张,一方面再次证明了时代与诗歌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则使诗歌在美学层面上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进而影响到诗歌的审美阅读。上述可以从“时代标准”去探讨新诗的现象,既包含着新诗审美走向多样化的可能,也包含着某种诗学上的“冒险”。结合近年来部分学者质疑许多新诗创作、网上关于某些迅速走红诗人的争议等现象,我们似乎应当对这一时代的诗歌写作进行反思或曰至少保持某种警觉。诗歌审美程度可以有高下之分,但却只有在审美的范畴中谈才有意义。热议甚至夸耀一些表面上徒具诗歌形态、实际上毫无美学价值的诗,最终只能混淆、破坏诗歌应有的审美标准。与此同时,即使是谈诗歌审美的“时代标准”,也不应当过分考虑诗人身份、评论者的推崇。从长远观点来看,诗歌审美的“时代标准”只能取决于历史,取决于诗歌本身以及那些常常被忽略的沉默的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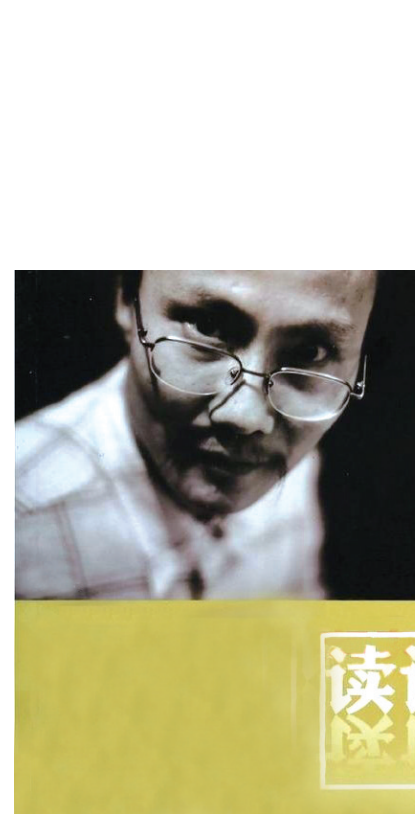
由此看待新诗审美的“普遍标准”,鉴于诗歌审美离不开读者、具体作品及相应的鉴赏关系,就诗质、诗性的角度而言,通过语言、形式、情境、韵致雕琢营造出诗歌本身的美感仍是新诗无法逾越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标准。尽管,在具体呈现时,每首诗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上述关于诗歌自身及其鉴赏层面的真善美是不能缺失的。也许在许多人看来,以上的提法并无新意,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言的新诗的审美标准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还应当是一个实践的课题。新诗处于中国诗歌的晚近阶段,不断处于发展变化的状态之中,这使得处于其中的研究者归



纳其审美标准时总不免带有很大程度的滞后性。但无论怎样,新诗作为中国诗歌之一部,需要符合中国诗歌的美学标准,否则必将会与读者阅读习惯产生抵牾同时失去自身的美感。同样地,新诗作为具体的艺术品,要遵循艺术美的共同标准,新诗可以通过探索和实践形成新的审美特质,但这种特质只是丰富了诗歌鉴赏中的审美论域,而不能彻底颠覆诗歌美的本质及相应的审美思维。

新诗的个人性

除“时代标准”和“普遍标准”之外,新诗的审美还在具体言说时带有鲜明的“个人性”。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涉及诗人的风格、心态和鉴赏者的



学养、趣味、习惯等多个方面,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展开。确认新诗审美标准具有多层次的特点之后,我们所要面对的自然是怎样呈现新诗写作中的美感问题。直观地看,新诗使用的是现代汉语、形式是分行的自由体,新诗现代、自由而灵活的特点,决定其可以通过语言、形式以及具体的手法,呈现自身的美感。新诗的美感在具体分析时自然需要历时的逐一举陈,但仅就阅读本身而言,其美感的实现往往是共时性的。优秀的诗作往往是在语言、节

奏、结构和手法的共同作用下,抵达美的境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之所以被称为新诗的经典之作、广为人知,其理由正在于此。美的诗歌离不开诗情、诗语、诗境等的共同作用或至少是对其中一个方面的强调,新诗之美不仅对诗人的素养和艺术能力提出要求,而且还在实际上对鉴赏者及其有效传播方式提出相应的要求。

需要强调的是,新诗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存在以深度和难度取胜的趋向;除此之外,重视立意、思想、主题以及采用写实手法的作品也在百年新诗历史中占有重要的比重。这些作品如果按照中国古典诗歌美学角度来看,多半会因“意境和时间感的割裂”而造成美感缺失,但是,如果从美学角度看待其包含的艺术美,那么,悲壮、雄浑、苍凉、崇高等等也可以作为衡量这些诗篇的美学标准。上述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截然不同的两种判断,其实说明新诗的审美标准因时间、地点、读者等原因,一直是一个相对的命题。“好诗”是否为新诗的审美标准提供依据?“好诗”、“优秀之作”可否等同于“美”的诗?其实还对“美”的标准本身进行了追问。所幸的是,众多诗人的实践已为人们谈论百年新诗的审美标准提供了典范之作,但无论就时间还是就丰富性的角度来看,新诗的审美标准还需要不断的历史化。新诗的审美标准是诗人、作品、读者、鉴赏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不由得让我们对它们特别是它们的未来充满期待。

小说需要“工匠精神”

——读谢有顺《小说中的心事》 □张国云

工匠不存,精神焉附。这个时候,强调工匠精神,显然是改革的要求。当今小说创作呈枯萎黯淡之势,它们的共性缺憾是作者文学修养的孱弱和写作心态的焦躁。就在人们对“工匠精神”千呼万唤的时刻,谢有顺的这本中国当代小说的主题论述集《小说中的心事》出版了。谢有顺从金庸、莫言、贾平凹等不同作家及作品入手,探讨了中国当代小说、人文领域的相关话题,是一部活生生反映中国文学“工匠精神”的指引。

工匠精神的第一要素是有趣有志向。对于为什么写作,常常听到有人说:“我除了写作,其他什么都不会。”说者也许是一种谦卑,其实真正的写作,应是通过小说语言活动,自身的价值得到体现,个人得以穿透社会和精神的封闭,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这个人又必须视小说为生命,正如谢有顺在《小说中的心事》强调的,“把小说视为生命的学问,从义理、考证、辞章这三方面来读解小说,这未尝不是一条新的路径。”

为什么写作,史铁生有句精辟的话:“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小说要通心。因为有心这个维度,它对事实、人物的描绘,更多的就遵循想象、情理的逻辑,它所呈现的生活,其实也参与对历史记忆的塑造,只不过,小说写的是活着的生命。这种历史,可能是野史、稗史,但它有细节、温度、血肉,有了它的存在,历史叙事才变得如此饱满、丰盈。所以,正确处理小说与历史、人世的关系,这不但是小

说的常道,也是对作者的要求。小说表达的是生命的哲学,它和现实中的人类,共享着同一个生命世界。如何把这个世界里那些精微的感受、变化解析出来,并使它成为壮观的生命景象,这是小说的使命。

工匠精神的第二要素是要坚持不懈。“写小说应该写的,这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个“应该写的”,就是这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既然是“基本状态”,那么就不会是在此时存在而在彼时不存在。谢有顺在《小说中的心事》中对我们提出忠告:“很多小说家都曾表示,自己读的书很杂,尤其是对那些方志、稗史、传奇、风物读物感兴趣,甚至对植物学、地理学或者器物收藏着迷,从而一直保持着自己对世界的好奇。这些貌似平常的偏好后面,其实能说出小说家的态度:他们对一种生活的了解,对一次生命过程的展开,同样需要阅读、调查、研究和论证……所以,小说家也是学问家,或者换一个词,是生活家——也就是生活的专家。”

小说一方面来源于虚构,一方面又离不开作家对生活的观察研究,通过钻研人类的生命世界,进而写出这一生命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未尝不是一种做学问的方式。也许传统的学问,探究的多是知识的谱系、历史的沿革,而小说作为生命的学问,目的却是解析人心世界的微妙和波谲。福克纳说,没有冲突就没有小说,米兰·昆德拉也说,小说的精神即复杂性,如何写出这种冲突和复杂,是大有学问在里面的。

工匠精神的第三要素是坚强忍耐。我们一般把那些通过不断的努力超越

一般境界的人叫做“匠人”。但我们周围缺少真正称得上“匠人”的人,是因为成为匠人需要经历种种痛苦和挫折。勇敢地直面困难,坚强地走出困境时,才能达到匠人的光辉巅峰。

生活中的许多事情,离不开忍耐坚强,不因别人的看法而改变,不因别人的冷漠而退缩,告诉自己,继续努力坚强。说出真实的自己,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这应当是小说家对自己的道德要求。谢有顺说:“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文学要从俗世中来,要有坚实的物质外壳,作家要有世俗心,要重视写人记事的合情合理,要尊重生活和经验的常识。文学既要精微的俗世经验,又要有深广的灵魂空间,二者的结合,便是我们理想中的好文学。

一方面,小说要还原一个物质世界、一种俗世生活;另一方面,小说必须是精神的容器。伟大的作家总是能够把他笔下的物质世界精神化,使它们成为心灵和精神的容器。所以昆德拉把小说家分成三种,第一种小说家是在复制这个世界,比如巴尔扎克,确实能很精微地复制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世界;第二种是解释这个世界,像法国的新小说家克洛德·西蒙,他们在不断地解释人和世界的关系;而最伟大的小说家应该是第三种,他们是在创造一个世界创造出来,他不仅是在创造一个物质的世界,也是在创造一个精神和心灵世界。

工匠精神还应具有批判性。谢有顺在书中最后一个章节中提醒道,如何批评,怎么说?批评家和作家的对话关系,之所以一直充满紧张和冲突,也正是因为批评要从作品附庸的地位上解放出来,它渴望以

自己的见解来赢得属于批评该有的尊严。“文学批评从不承认对作家的‘跟帮’角色,它最大的野心,就是通过‘作家作品’这一个案来‘建构’属于批评家的‘历史’。”当这种由公正和自由建构起来的批评风格,着眼点落实到了文学价值的肯定、人性的存在上时,就意味着批评从幽闭的价值世界走向了人类宽阔的精神世界。从这个起点出发,批评有望重塑文学的价值世界,并引导文学像过去一样积极分享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侧面。

在这里,《小说中的心事》是一次对以小说为天地立心的探讨,重申对文学价值的信仰,重申对人类内在在精神生活的理解。没有哪一篇小说能随随便便成功。德国和日本是举世公认的具有“工匠精神”的两个国家。我们看到的是“德国制造”、“日本匠人”,我们看不到的是这背后的思想渊源。我们从来缺少思想,我们缺少的是对思想的传承;我们也从来缺少精神,我们缺少的是对精神的践行。可以说,“工匠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坚定、踏实、精益求精。小说工匠不一定都能成为小说家,但成功的作家身上一定不可或缺这种“工匠精神”。

当中国作家越来越擅长用永恒的人类共同情感书写中国故事的时候,相信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会带给世界惊喜,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精品。谢有顺的《小说中的心事》也许正好赐予文化匠人们一支难得宝贵的令箭——有文学家的情感,有思想家的判断,还有批评家的立场,这些不正是我们当下苦苦寻找的“工匠精神”吗?

我的批评观

□朱崇科

于我而言,某种意义上说,选择批评,尤其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首先是“中文系更多培养学者”的直接证明之一(但身上的文青气似乎隐约可闻,未曾散尽),当然更重要的却还是自己的内心“抉择”。说“抉择”貌似夸张,其实不然。因为出身贫寒的我如果不是因为父亲恰恰是在我2000年徘徊于就业和继续出国攻读之间时因肺癌离世,那么我很可能为了生计而暂时放下批评梦想而变成一名记者。

在此基础上说,批评首先是一种富于担当、良心和勇气的志业。因为批评不是简单的表扬修辞学,不是内容空洞、辞藻华丽的文字表演,更不是摇摆于权力和金钱之间的奴婢乃至妓女。它是一种直接的介入、敏锐的判断,甚至是深刻的灵魂反哺,对象既是不同时空的文学文本,又是大地、民间和灾难深重的文化母国。

其次,批评又是一种值得尊敬和修炼的精英专业。它有自己的规范、门槛、创造力和激情,它要论从史出、严谨客观,但同时又必须高瞻远瞩,幽幽洞微,有所取舍,绝非是猥琐的跟在创作后面亦步亦趋的寄居或寄生。

再次,批评必须永远是包容和年轻的课业。为此,我始终对不同区域华语文学乃至人文文学的互动保持高亢兴趣,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样,我一直提倡和坚守的“华语比较文学”同样也是对中国大陆文学创作和书写的一种观照、丰富和善意提醒,这样的批评既有本土关怀,又有国际视野。

批评,也是一种永远的在路上。不过是,我以感受文学的方式面对世界与自我、现实与图像、历史与未来。